

#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 新闻学界泰斗赵玉明逝世 下

末，“文化大革命”风暴中的北京广播学院被“四人帮”一伙污蔑为“黑基地”，全校师生被迫迁往河北保定的望都县农村进行“斗、批、改”，赵玉明也在这段时期跟随着大家一边拿镰刀，一边喊语录。

回忆起那段经历，赵玉明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1970年11月初，中央广播局因为要筹备延安广播历史展览，紧急把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一年以后，展览告一段落，我打点行李准备返回干校，但没想到组织又分配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上班，我参与了报摘、联播节目的编辑工作，干了将近一年半。”

1973年春，历尽低谷的广播学院恢复招生，赵玉明从中央台又回到了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的广院，一边修整校园，一边迎新备课。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赵玉明也渐渐迎来了他事业的发展：1979年，他成为广播学院第一批硕士生导师；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4年调升为新闻系副主任，后历任代主任、系主



任；1988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经民主评议，出任广播学院副院长，至1998年2月离职；1999年，赵玉明成为广播学院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招收新闻学专业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4年，他又随着学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立担任了流动站的合作导师（编者注：北京广播学院于2004年8月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

“1988年我晋升为教授时已经52岁了，这在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和现在30多岁的优秀青年教师即可晋升教授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赵玉明事业推进的每一个足迹，几乎都折射了北京广播学院事业发展的步履从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个体与环境的特殊。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赵玉明参与了中国广播史上的一项重要考察——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

创建史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进行了重新考证。“为了实地考察延安台的早期旧址，广播学院组织了以齐越教授为首的调查组，我是成员之一。在温济泽、杨兆麟等几位‘老广播’的指导下，帮助下，我们历时20多天，对延安（陕北）台的编辑室、播音室和发射台等14处旧址分别做了实地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

1980年底，中央广播局听取讨论了“老广播”的建议并报中宣部批准后，发出了关于更改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通知》，将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日从1945年9月5日追溯到1940年12月30日，这个更改可谓意义重大。

上述《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10期文章还介绍：在赵玉明几十年耕耘的学术沃土中，有一个话题很少有人问及，而眼前的这位老先生却举重若

轻，并不避讳，那就是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

赵玉明说：“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特别是对中国早期的广播史，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是正常现象。就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争鸣也是必要的，没有学术的争鸣和讨论，学术研究也不能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对学术讨论一定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正是怀着对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一片赤诚，从教从研半个多世纪的赵玉明为中国广播电视学留下了一笔笔财富。1987年，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出版，被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评价为“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1989年，他主持编纂的我国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广播电视简明辞典》问世，并于1999年由他主持增订后更名为《广播电视辞典》再次问世。

1994年，赵玉明又主持编纂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广电专业百科全书——《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2004年，由赵玉明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正式出版。2012

年，他主持完成了本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对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和架构等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据《人民日报》2004年5月消息，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日前在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举行。会议组建了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新一届常务理事会经协商推举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任名誉会长，北京广播学院赵玉明教授任会长。学会新聘新闻史方面专家宁树藩、丁淦林和陈业劭教授为顾问。

卸任会长职务后，赵玉明教授继续担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闻传播学方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学会是在我国著名新闻传播史学者方汉奇、宁树藩等教授的倡导下，于1989年4月经民政部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部。